



多维探索：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uowei tans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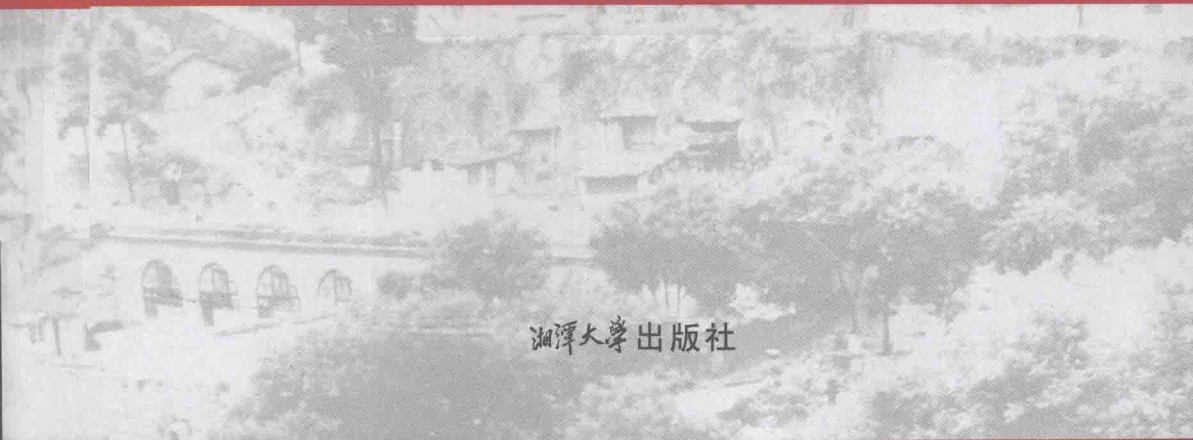
yanan zhishifenzi

yu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张海燕◎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多维探索：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uowei tansuo
yanan zhishifenzi
yu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张海燕◎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探索：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张海燕著. --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81128-586-4

I. ①多… II. ①张…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1935~1948②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1935~1948 IV. ①D663.5②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7355号



责任编辑：李

封面设计：廖铁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0731-58298960

邮 编：411105

网 址：<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湘潭地调彩印厂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6.5

字 数：258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586-4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9YJC710039) 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
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1
二、选题的价值及基本研究思路	7
三、研究现状及本书的创新处	10
四、研究方法	17
第一章 延安知识分子的聚集及人物谱系	20
第一节 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	20
一、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概况	21
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缘由	22
三、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	31
第二节 延安知识分子的集结	33
一、延安知识分子的分布与主要功能	33
二、延安知识分子的聚集	38
第三节 延安知识分子结构分析	42
一、主要代表人物	42
二、人物结构分析	49
第二章 延安知识分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	57
第一节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57

多维探索：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	57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载体·····	64
第二节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68
一、致力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69
二、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	71
第三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论证 ·····	75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75
二、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83
第三章 延安知识分子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93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93
一、延安史学工作者队伍的概况·····	93
二、延安史学研究中国化的影响因素·····	97
第二节 延安知识分子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	104
一、探讨史学研究中国化的发展方向·····	104
二、延安古史分期的学术争鸣·····	107
三、评价历史人物·····	113
四、清算经学·····	117
第三节 延安史学研究中国化的成就及评价·····	119
一、延安史学研究中国化的成就·····	119
二、延安史学研究中国化的评价·····	121
第四章 延安知识分子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25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条件·····	125
一、延安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	125
二、延安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	128
三、延安哲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延安新哲学会·····	130

目 录

第二节 延安知识分子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133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讨	133
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	139
第五章 延安知识分子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	157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条件	157
一、延安文艺界的主要代表人物	157
二、延安文艺研究的主要思想资源	164
三、主要的延安文艺团体	166
第二节 延安知识分子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167
一、对马克思文艺中国化的理论探讨	167
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实践	173
第六章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建构	187
第一节 延安知识分子的理论活动	187
一、译介马列主义	187
二、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研究	189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190
第二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理论创造	212
一、毛泽东的理论创造	212
二、毛泽东构建新的话语体系	213
三、延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互动	216
第三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确立	220
一、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准备了雏形	221

多维探索：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提供最好的参照	225
三、推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229
结束语	234
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56

绪 论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解之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书选取延安时期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时期，力图探讨延安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何为延安知识分子？在给延安知识分子下定义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知识分子。学界人士对知识分子各有不同的分析和界定，为论述清晰起见，有必要作一概念的界定。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的概念。在西方主流学者眼中，知识分子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和定义，偏重于其精神与心态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学者对知识分子认知的理论工具主要来自西方，大致认为知识分子具有两类特征：一是学有所长，二是对社会的关怀。可见不论中西，都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往往又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的批判。知识分子何以偏爱批判？这是由知识分子的天性决定的。知识分子天生的功能在于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他们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距离。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完美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们所处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

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

知识分子因其怀疑与批判的天性，往往热衷于政治参与，与政治权威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有他们特殊的怀疑者与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与政治权威接近，以实行其主张。有研究表明，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的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地主、官僚的合一促使知识分子扮演社会支配集团的政治角色，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倾向——“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他们仍不失知识分子的本原角色，他们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载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因而具有一定的批判和抗议精神，这就是他们的“道统”。^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始终以“道统”为核心，致力于以学术领导政治。因此，传统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生活，不只是为了获取权力，同时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升华。这一价值取向对后世影响很深。法国思想家福柯更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的。^②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择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知识分子。

具体怎样界定延安知识分子？在回答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些研究者的相关定义：刘悦清认为，所谓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从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至1945年抗战结束这一时期集结于延安经受革命战争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集合体^③；朱鸿召认为，延安文人是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汇集在陕北一隅的较为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④；耿化敏认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延安为中心凝聚形成的、以思想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知识分子群^⑤；谢泳认为，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在内。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

① 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②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146页。

③ 刘悦清：《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④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⑤ 耿化敏：《试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

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而言，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① 上述定义都强调了时空特征，也都指出了这一群体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特征，但不足之处在于都没有指明这一群体的功能是什么。

本书所要研究的延安知识分子是与一定的政治权威结盟的知识分子，主要在意识形态^②领域工作。马克思对此类知识分子有过阐述，认为随着统治阶级内部分工，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了，他们是统治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学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③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称此类为一定的社会政治体制或利益集团作意识形态辩护的知识分子为“有机知识分子”^④，波兰社会学家弗·兹纳涅茨基则称其为“党派圣哲”。^⑤要成为这类知识分子，需要具备的最基本条件有二：一是必须拥有和掌握那些被社会评判系统所认可的知识和精神资源，成为一个或多个专业领域的精英，具有向社会发言的权威；二是自愿加入到政治斗争的行列，成为某一党派的工作人员，为该党派实现政治理想服务。在中共的历史上，涌现了大量的此类知识分子。石仲泉在《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中对他们的特征作了这样的注解：“……就社会科学而言，包括哲、经、法、文，特别表现在历史、中共党史方面，尽管许多学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学术研究，但由于一部分人又兼做领导，因而事实上就存在着一个

① 谢泳：《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② 意识形态是由信仰、理念、思想理论等一套文化符号所组成的观念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与诠释非知识分子莫属。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④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区分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前者是指作为一定的社会政治体制或社会利益集团有机的组成部分，为该体制或利益集团作意识形态辩护的知识分子；而后者是指游离在体制之外、不属于任何阶级或集团的文人、学者、艺术家等。（〔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9页。）

⑤ 关于“党派圣哲”，参看〔波兰〕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的有关论述。

以乔木同志为首，包括胡绳同志在内的，从党的事业、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出发，在从事各科学术著述的同时，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着力研究、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派。”^① 此类知识分子往往扮演多重角色，在中共的政治术语中有时称作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时又称作党的理论工作者。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里谈到要把理论工作者“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并指出，“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理论工作者”。^②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理论工作者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并非一般的知识分子所能胜任。可以说理论工作者是知识分子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

延安时期，在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话语中，“具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不论住过中学和中学以上的学校与否）程度的人，可以算做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已能利用自己的知识文化作为日常独立自修的和必要的文字文化等工作的工具了”。^③ 因而其“知识分子”概念指称的对象较为宽泛，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包括知识青年（青年学生）。在当时，知识青年大都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政治行为的发生除了必须有强烈的行为动机以外，还需要一定的资源。“有些事情我们有能力去做，但缺少动机——如买枪杀人……有些事情我们有动机去做，但缺少资源——如成为总统或议员”。^④ 可见，对于政治行为而言，动机与资源二者缺一不可，并且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资源的多少会影响到动机的强弱。虽然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在思想倾向上与中共保持一致，但其中大部分由于受学识所限而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构建工作望而却步，而只有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在各自专业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所成就者才有可能凭借学识脱颖而出。

① 石仲泉：《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百年潮》2001年第6期。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③ 李学：《怎样了解〈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的几个问题》，《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20日。

④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本书所研究的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聚集在延安的以研究、阐发和宣传中共意识形态为主要职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其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看也可称之为“理论知识分子”。^①从为自己所在的集团自愿作意识形态辩护这个角度而言，身处延安的理论知识分子发挥着“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

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集体组织的形成，都需要某种外部刺激条件和内部凝聚向心力。延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形成也是外部刺激和内部凝聚向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共自成立以来，理论素养不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全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理论建设，选调一批理论知识分子到延安，充实延安的理论队伍，客观上促成了这一群体的形成。这一群体在人员构成上是比较复杂的，从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从中央苏区或其他根据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第二类为从国民党统治地区或沦陷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第三类为从国外返回延安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中的多数成员在来延安前或在理论上或在学术上皆有所成就，他们奔赴延安的心路历程各异，但到延安后大都围聚在中共领袖毛泽东身旁，并致力于毛泽东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需要对它的主体、动力、目标、实现途径、保障机制等方面作出阐释。按理论界、学术界一般说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新理论，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扎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书以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学理的常识外，还特别需要立足这一命题提出的历史语境加以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

^① 这一概念的使用只是为了突出知识分子理论创造的功能，对其内涵与外延本书不作深究。

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而后，在1941年9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他在实际行文中不怎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代用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国后将其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文集》时更是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义语，事实上两者还是有差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的是一种创造或创新。基于历史语境，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注意：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必然选择。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即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流，它的中国化是其在中国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状态。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完全中国的东西，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是基础和前提。第三，为了达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做法和中国气派。第四，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本书研究的时限主要集中在1937年到1942年这一时段，作这样的限定主要出于如下考虑：

第一，延安时期作为一段历史的代名词为人们所熟悉，不仅在于它当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也在于它对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仍然还在发酵。一般而言，延安时期始自1935年而止于1948年。以

^① 参见《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942年的延安整风作为这段历史的分界点在学界已有一定的共识。无论从知识分子的演变历史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而言，延安整风都是一个临界点。^①

第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段已大体成形。据已公开的资料，本书所涉及的知识分子大多在延安整风之前到达延安。

第三，作为本书研究主要资料来源的延安时期的理论刊物和学术刊物，如《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妇女》、《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等大多在1942年延安整风之前停刊。

二、选题的价值及基本研究思路

立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来研究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它的学术价值。把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研究，可以扩宽研究的视域。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研究中，不管是对于思潮的研究，还是对于人物的研究，学界往往把目光锁定在中共领袖身上，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则关注较少，即使有些研究也不甚客观和全面。具体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学界大多注重中共领袖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却很少讲到理论知识分子群体，即使有也主要是一些个体研究，这一研究状况不利于全面客观认知历史。因

^① 有研究者在探讨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历程时，以1942年延安整风为界划分为“自由言说”阶段和“整风改造”阶段。（耿化敏：《试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有研究者把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延安整风为界分成两段，前一阶段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后一阶段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前者偏重于倡导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后者偏重于解决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前者为后者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中国化运动内容的深化和规模的扩大”。（左瑞芳、左玉河：《抗战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而通过研究可以弥补这一学术上的不足。

二是它的理论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武器，中国的实际是客体，致力于这两者结合的个人、群体、团体和组织等都是主体。不同的主体，发挥的功能和具有的地位是不同的。作为主体之一，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功能又比较特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就不能不关注知识分子。放眼延安时期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重大进展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得以形成并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得以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开始成为规范人们的政治和学术活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在理论形态上得以实现。这些成就至今还在规范和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这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特殊价值的历史是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的。历史已表明，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贡献，但贡献有多大？虽然不能完全量化，但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运用一定的方法还是可以适当考量的。通过研究，有助于对知识分子能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独立发挥作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三是它的现实意义。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皆思想史。^① 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中共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等等，这些都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立足于这些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延安知识分子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尽管他们的观念与思想，是他们对当时的具体问题进行概括思考的结果，但这种概括对于今天同样具有启示意义。这是因为，人类面对的问题与矛盾往往具有类似性、同类性或同构性。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实践的

^① [英]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页。

主题发生了变化，但前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范式仍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正确认识和利用好这些思想资源是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总之，把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研究，可以深化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突出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化”的作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创新形象，凸现知识分子在处理与中国革命关系时的个人和群体的“经历和体验”，为今天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提供资鉴。

本书的研究思路主要受下述看法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有两重身份：就学术层面言，它是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学术，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解读，可以百家争鸣。通过切磋和探讨，对它的解读越来越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学说的原意，这是好事。就政治层面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① 同样，有学者把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并对两个层面的中国化作了界定和区分。^② 这一区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也有助于在学术研究中量化不同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并为区分不同主体的作用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历史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就已从学理和政治两个层面展开，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为学理层面从属于政治层面的格局。与之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内部也出现了相对分工，

^①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备受关注》，《北京日报》2007年5月28日，第18版。

^② 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主要的着眼点是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属政治领域或政治学范畴。这个工作主要由革命家、政治家做，由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任务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层面的中国化相比，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属于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的中国化，其成果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作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主要考虑的是管用不管用，能否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无须更多地去考虑学科体系、结构和内容（这并不是说这方面的理论没有体系，或不必有体系），而作为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必须考虑学科体系、结构和内容的科学性、完整性的问题。（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区分》，《理论前沿》2003年第18期。）